

编者按

60年来,《中国科学报》一直关注、记录、讴歌科学家群体的故事。王大珩、彭桓武、朱光亚、侯祥麟、张光斗、师昌绪……这些学术大师们闪闪发光的名字永远留在报纸上,无惧岁月、历久弥新。在此,让我们追溯本报报道的历史轨迹,再一次感受大师们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风范。

不一样的科学大师:真性情 竞风流

■本报记者 李晨阳

2007年3月6日上午,北京城春寒料峭。八宝山殡仪馆,300多人在寒风中静静等待。队伍里一个年轻人早已泣不成声,他手中是一份《中国科学报》(时称《科学时报》)——纪念两弹元勋彭桓武的特刊。

再不采访彭老,就来不及了

就在彭老去前一年秋天,本报几名记者到彭桓武在中关村的家中,与先生促膝长谈。当时的气氛,被文字忠实地记录下来——“午后,屋内静谧。光——这个量子世界的精灵——迢迢千里投射进来,照亮了排排书架上的经典书籍,整个屋子充满了物理的气息。”

这篇6000字的报道《两弹功勋彭桓武:天殷嘱我重新文》,此刻看来无比珍贵。时任《中国科学报》副总编辑郑千里是在场的记者之一,也是这次采访的发起人。“没什么特别的新闻由头。报道这样的科学大家不一定需要由头。”

彭桓武天性“喜物恶人”——对自然界有广泛浓厚的兴趣,对人世纠纷则及早躲避。有人慕名造访,也常在门口就被劝退。曾有大领导来看望他,久久叩门不开,请人打电话联系后,彭桓武才穿着睡袍走出来攀谈。

郑千里知难而上,邀请与彭桓武感情

深厚的欧阳钟灿院士从中牵线,争取到了宝贵的采访机会。“彭老虽然不主动接触媒体,但他接受采访时,还是坦率爽直,知无不言。”

采访结束时,彭老赠送记者们一人一本诗集,还用已经有些颤抖的手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当时我刚进报社不久,这是我第一次与这样的科学大家面对面,这也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报道面世后,引起了广泛关注。郑千里还记得,不少同行都对他说:“你们竟然采访了彭桓武!”

文中的小标题令读者津津乐道:“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点题他成长立志的经历;“世乱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新文”,抒发他求学生涯的感慨;“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激荡他报效祖国的胸襟;“惟童心不泯,笔端期颐,总似年轻”,述说他老骥伏枥的志趣……

“这些诗都是彭老自己的作品。”刘东峰说,“我写作时这么设计,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彭先生是一位文理兼修、热爱传统文化的大科学家。”

彭桓武去世后,《中国科学报》推出了整版纪念报道。记者从欧阳钟灿、黄祖洽、吴岳良、李佩、庆承瑞等故交那里,搜集来彭老生前点点滴滴的故事,把一代学术泰斗的面貌描绘得更为完整圆融。

李佩回忆,彭桓武的儿子赴美国读书,改学了生物学。一次她在图书馆偶遇彭桓武,问他:“看什么书呢?”“生物。”他

回答,“我需要与儿子有一点共同语言。”

多年照顾彭桓武的刘金玲大夫则回忆,彭桓武夫人去世后,自己想给他介绍老伴。“他说,‘你跟我来,’然后走进卧室指着夫人的照片说,‘我怎么是一个人?如果你介绍个年纪大的,我得照顾她;如果你介绍个年纪小的,就只能是人家照顾我,这不是坑人吗?’”

钱三强评价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无论是他的功业还是人生,都包含着大段鲜为人知的静默。好在有这些报道,彭先生百年之后,读者仍能收获一份跨越时空的感动。

永远讲述,永远满腔热血

60年来,《中国科学报》一直关注、记录、讴歌科学家群体的故事。彭桓武、朱光亚、侯祥麟、张光斗、师昌绪……这些学术大师们闪闪发光的名字永远留在报纸上,如明珠连缀,如星斗高悬。

数十年斗转星移,世殊时异,如今人们对科学家的想象和期待已经大大改观。本报一名记者还记得,她在报道中写到某位大科学家清贫度日,只问耕耘时,有人就言辞激烈地评论:“不要再再用过去的标准要求我们!”

这也是当下科学记者们常常会遇到问题:今天,我们该怎么讲述这些大师的故事,传递他们的科学精神?

2016年是邓稼先逝世30周年,笔者接到了相关报道任务。在搜集材料和采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人们恰恰对这位最熟悉的科学家有着最多的误读。

在《还原真实,才是最深的怀念》这篇报道中,笔者对邓稼先“是否抛弃别子数十年”“是否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是否亲手捧回碎弹片”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还原。真实的邓稼先故事,读起来没有那么“苦”,那么“惨”,那么一本正经。他为了请手下几个大学生看戏,甚至专门候在戏院门口等人退票,逢人便问:“有票吗?有票吗?”

报道发表后,收获了热烈的反馈。有读者写道:“今天读这篇文章,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谦虚严谨的科学家,而不是一个神化了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去年9月15日,“天眼之父”南仁东因病去世。100多天前,他远赴美国,自此一去不返。在他动身之前,FAST工程调试组组长姜鹏从贵州给他去了一通电话。电话中南仁东一反常态地问:“你有时间回来吗?”

姜鹏直率地回答:“FAST这边事儿太多了,我可能回不去。”就这样,他没能到南仁东出国前见上最后一面。

“这句话成了扎在姜鹏心上的刺。”《中国科学报》记者丁佳在特别报道《睁开了“天眼”》记住了“老南”中如此写道。有关“老邓”和“老南”的这两篇报道,日前双双获得2018年科技传播奖。

科技人物报道中的“人情味”,不再是锦上添花的作料,而成了不可或缺的灵魂。

《中国科学报》的60年,也是与中国科学家们共同走过的60年。在记者们的笔下,所谓科学精神、所谓爱国情怀,不再是激昂却略显空洞的口号,而是直见人心的故事;所谓大师名家,所谓大师国土,不再是伟岸却千人一面的符号,而有着出乎本色的性情与风流。

专家点评

“科学”与“人物”不可偏废

■孙世刚(中国科学院院士)

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是非常值得报道的人物群体。但他们不是神,而是令人敬佩的普通人。他们对科技事业有着过人的执着,但也一天天过着烟火人间的生活。

我认为好的科学人物报道,“人物”与“科学”两个要素都不可偏废。

一方面要把人写得生动鲜活,让读者觉得他第一不是高不可攀,第二不是不近人情。过去报道科学家,喜欢写他们异于常人的地方,比如牺牲家庭,比如带病工作。我觉得这样的确不太合适,毕竟没有好的身体,没有安定的家庭,科研工作肯定也会受影响的。另外我还有一种认识,就是科学家们

的专注真诚是一种稳定的品质,对工作如此,对家人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不能放松对报道科学性、科普性的要求。既然是写科学家,还是要介绍他们的研究领域,阐释他们的科学贡献。让老百姓读了,知道这些东西虽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际上并不遥远。甚至能让更多年轻人从这

些报道中,萌生出学科学、爱科学,自己也想当科学家的理想。

科研工作的艰苦和寂寞是客观存在的,报道中应该讲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想,这应该是新时代宣传科技人物、传播科学精神的应有之义。

(本报记者李晨阳采访整理)



代表性文章

在“地狱”入口处——记双目失明的科学家侯永庆 (1993年12月17日)

地球之子刘东生 (2008年3月10日)

王大珩院士:爱祖国天经地义 (2010年6月3日)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朱光亚代表了一个时代 (2011年2月28日)

走近这样一位世纪老人——侯祥麟科学精神座谈会侧记 (2012年4月6日)

“热心”师昌绪:忠于事只为信仰 (2014年11月11日)

周立伟院士忆王大珩院士:大珩百岁光永恒 (2015年3月13日)

百年彭桓武:“默默无闻”的大师 (2015年10月8日)

眼光与担当:从一个改变中国的科技战略说起

■本报记者 王静

1996年4月19日,《中国科学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863计划’缘起、发展及展望”的文章,作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光学家王大珩。

此时,距离王大珩牵头,与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几位科学家共同提出的“863计划”开始实施,已有十年时光。

一个改变中国高技术发展的计划

这篇文章,是王大珩对“863计划”实施后的深邃思考。

本报原副总编辑黄安文回忆,文章并非报社约稿,王大珩完成文章后,直接联系了报社,并派专人送到报社。

“当时,他希望更多人了解‘863’,理解‘863’,传播‘863’,使‘863计划’得到更顺利的发展。”黄安文说,“我们看完后,当即决定刊发。”

在文章中,王大珩给“863计划”实施十年确定了基调:“863计划”实施至今成绩卓著,现在正在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对于“863计划”发起的那段历史,本报原副总编辑郭日方非常熟悉。30多年前的某一天,王大珩在家读到了美国发布的《战略防御倡议》,忍不住给老朋友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分别打了电话,询问他们阅读“倡议”的感触。

“美国里根总统的SDI《战略防御倡议》,除了为两霸争雄显示威慑力量之外,是对美国发展高技术的一次冲击,也是对

世界各国高技术及国力发展的一次挑战。”王淦昌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坐以待毙,置之不理。”杨嘉墀、陈芳允、王淦昌回复给王大珩同样的答案。

经商议,王大珩执笔起草了《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字斟句酌进行修改。定稿后,他们将报告递送中科院办公厅,请时任中科院高技术局局长张宏通过有关渠道转呈邓小平。

在这份报告中,王大珩等科学家建议,国家投资2亿元人民币,在7个学科开展高技术研究,以应对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阅读建议后即刻批复:“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并批示投入100亿元人民币。

报告获得批示的时间是1986年3月,国家高技术发展研究计划因此被命名为“863计划”。

数月后,中国高技术研究计划具体实施细则形成,1987年正式付诸实施。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新能源和新材料7个领域,作为国家“863计划”部署的主要领域,分15个专题进行攻关。国家“863计划”由此启航。

一篇肇画科技蓝图的文章

王大珩在“‘863计划’缘起、发展及展望”一文中,阐释了自主创新对于国家的意义。他指出,“改革开放,技术引进,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我国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但也要看到外商把我们看作他们的技术市场。我们必须在高技术努力,使技术上保持自主权,这是提高我国国力所必须的”。

文章刊出后,科技部“863计划”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对“863计划”的实施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总结。不久,在该计划一次总结报告中,科技部对计划的执行进行了调整。

科技部原副部长马颂德曾分管“863计划”,他在“十五”开局之年宣布,在管理模式上,“863计划”将把“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的实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突出知识产权目标,促使“863计划”更加注重创新。在课题评审、验收等评价环节中,将是否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实现“863计划”从重点跟踪到跨越的转变。在课题承担方式上,“863计划”也着手新的招标和委托研究相结合的模式。

30多年来,中国几代科研人员以承担“863计划”课题任务为荣。郭日方感慨说,走过30年,“863计划”固然已成历史,但它永远是中国科技发展进程中最为辉煌的一面旗帜。发起人王大珩的话语,对于今日之中国仍铿锵有力,闪闪发光。

一组促成行业问题解决的报道

如郭日方所言,王大珩心里只有国家的荣辱。他一旦发现问题,就会锲而不舍想办法解决。

中国仪器仪表的研制在很长时间内

是王大珩的一块“心病”。他认为,“仪器仪表的研究工作在组织上比较混乱。种类不少,品质相同,缺乏先进的技术内涵”。

2007年春节前夕,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去看望他,王大珩再次特别提及,仪器仪表研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聊完之后,路甬祥建议《中国科学报》不妨去深入调查。

经过大量的资料梳理和采访,我国仪器仪表行业存在的问题逐渐清晰起来,《看似配角实为核心》《中国仪器仪表何以没有领军人物》等系列报道在本报刊登。

这些报道引起了当时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和中科院领导的关注。几个月后,中科院计划局提出了报道中科院关于仪器仪表研究进展的计划,中科院牵头,联合相关科技管理部门开始讨论国家科研仪器仪表研究的立项。半年之后,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先后启动设立国家仪器仪表专项研究基金。

像王大珩这样,毕生忠于事业,高瞻远瞩,为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决策和科学技术发展贡献智慧的科学大师不在少数。

“好管闲事”的著名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师昌绪,兼具“战略眼光”和“跨学科眼光”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东生,“气象万千”的著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无一不是以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思想,履行着科学家的使命,以真知灼见为国家科技战略建言献策,以科学研究引领国家科学的发展。这样的精神和品质,深刻影响着后来人,在传承中,发扬至今。

专家点评

先生用一生践行“战略与创新”

■郭日方(《中国科学报》原总编辑)

重读旧文,引起我对王大珩先生的深切怀念。我最后一次见到王大珩先生,是在一次讨论中国科学院发展战略的研讨会。老人家精神矍铄,由于听力不好,他时不时用一只手掌放在耳后,认真聆听每个人的发言。会上,他对中国科学院乃

至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发表了重要意见。

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7年多了,但是,王老的精神、品格、人格,永远就像一座丰碑矗立在我们面前。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两弹一星”元勋,更是一位始终都在关注着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科学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提升,最基本的一条经验是:做好战略部署,抓好创新发展。王大珩先生用他一生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巨星虽然陨落,他划过长空的光芒依然璀璨明亮,还在指引着我们继续砥砺前行